



建党百年·礼赞

范志博：她们，塑造了我的演员“品格”

邓玉芬，王玉荣，宋鱼水……她们塑造了我的演员“品格”。用艺术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这样的角色我必须演，而且要演得真，演得透！

我渴望做一名“流量明星”，不断地扩大“角色影响力”，但我更渴望把流量变成“正能量”，去影响观众，感染观众。



▲ 电视剧《你迟到的许多年》中范志博饰演文婷。



电影《真水无香》中范志博饰演法官宋鱼水。

■ 口述：范志博 演员
■ 记录：徐阳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我是范志博，作为一个演员，我不能说有多知名，但是我演过的很多角色，都是真正家喻户晓的名人。比如，《建党伟业》中的革命家蔡畅；《中原女警》中的一级英模王玉荣；《真水无香》中的法官宋鱼水……很多时候，与我说我是在演绎她们，不如说是在向观众呈现她们最真实的面貌。这些优秀女性所焕发的精神力量也一直影响着我，与角色一同融入了我的血脉，并努力去塑造一名演员质朴和谦逊的职业品格。

“英雄母亲”邓玉芬教会我在绝望中坚守信念

《天下娘亲》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时代，邓玉芬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的壮烈事迹。

读完剧本后我很感动，但这种感动仅仅是被人物的事迹所震撼，而当我身临其境，“走”完她的人生时，最深的感受是“苦”和“痛”。整个拍戏的过程都很“煎熬”，剧中主人公的孩子相继去世，最后丈夫也牺牲了，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磨难。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哭，反复体味着亲人逝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绝望。

一开始，我不理解邓玉芬的“狠心和决绝”，对那时的农村妇女来说，儿女是她的天啊！她怎么舍得让稚气未脱的孩子去直面战

场？后来，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起初邓玉芬的大儿子自愿去当兵，她非常生气，坚决不同意，到处去寻找孩子。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她：她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了7名战士一直守着村里的山坡地。那些战士对她说：“娘啊，我们的娘已经没了，我们要是不守住这个阵地，千千万万的娘就都没了。”邓玉芬一下子醒了，别人的儿子为了别人的娘，能牺牲自己，那我的儿子去当兵为什么不行呢！后来，邓玉芬不找大儿子了，而是把儿子一个一个送去保家卫国，其实这个时候，她已经知道大儿子牺牲了，再送出的孩子可能就是在“送死”。我想，人都是有“私心”的，没有谁生来无私，但是国家危难，心中有大爱，才能凝心聚力战胜邪恶。

有天我拍夜戏，需要连排两场“坟地”哭戏，分别是邓玉芬大儿子和二儿子牺牲后，母亲去坟上祭奠他们。拍到最后我有点绷不住了，因为接连的哭戏，不光是眼泪哗哗流，情感上也在经历一波又一波密集的痛苦。整个环境，塑造的氛围，让“我”这位平凡而又心怀大爱的母亲，体会到英雄身上所承载的辛酸和伟

力，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我常常想，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前路，邓玉芬如此孤勇地在灰暗中前行，她不是一无所有，她眼里还有对未来的那一束光，就是这绵延燎原的星火之光，汇聚成了照亮中华大地的初阳。也是这种感同身受的力量，支撑着我在泪水中坚守角色的初心，不被悲观的表达困阻，寻找人物信仰的藤蔓。

直到有一天，在去拍摄的路上，我看见一群正要入伍的新兵迎面走来，这些年轻人穿着军装，背着行李昂然前行，突然我泪流满面。我意识到，革命年代，一位母亲送别当兵的孩子，可能就是最后的道别。而现在的孩子，是背着大红花，骄傲地踏上军旅生涯，这是多少人努力挣来的幸福啊。

这部戏结束后，因为哭戏太多导致双眼红肿不退，不得不去就医，一位中医说我是“肝气郁结”，进而上延到眼睛。我尝试着慢慢走出人物，半年后我的情绪稳定了，眼睛也不治而愈。我认为这就是演员的一份担当和责任，用艺术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这样的角色我必须演，而且要演得真，演得透！

不爱红妆爱武装

我的演员之路是“经历”更是“历练”。拍宋鱼水，我跟了宋法官半个月，她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开庭开会我就在旁边听，虽然不太懂司法专业术语，但她的工作精神在影响着我；拍女副县长，我全程体验她的工作生活，对基层干部招商引资的艰辛、处理突发事件的果敢有了新的认识；拍女装甲团长，导演让我三步跨上坦克，三分之一的戏份是在泥水里滚打；拍沂蒙六姐妹，冬天河里站着，炸药爆破泥沙俱下，已算不上苦。

一开始入行，谁都喜欢漂漂亮亮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拍摄的环境相对舒适，安全，谁也不想成天泥里爬，雪堆里滚。《女装甲团长》的导演在筹拍之初，找了很多女演员，都不愿意来演，因为太苦太累。当导演向我抛来橄榄枝时，我也犹豫过，这部戏对身体素质、抗压能力要求特别高，我担心不能胜任。后来身边的朋友都劝我，“这么好的角色你应该撑起来，你不演谁来演？”

刚进剧组，导演突然问我生理期是什么时候？我当时一愣，不知道问这个干嘛。后来才知道要长期泡在泥地里拍戏，那时候浑身脏得一天要洗三次澡，洗完了再去拍，脏了再洗。等终于从泥浆里爬起来，要拍坐在坦克里的戏

份时，我心想难关总算过了。可谁曾想又一个难关摆在面前：我必须三步跨上坦克，这可是实打实的要自己完成，不用替身。这个动作，我练了三天，终于顺利完成任务。

可以说，我是在“摸爬滚打”“上天入地”中拍完了这部剧。2004年，我凭借《女装甲团长》获得第四届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最佳表演艺术奖。那一刻我悟出一个道理，作为演员，能不断去展现优秀女性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是我的“特殊使命”，这既给予了我巨大的职业成就感，也指明了我从艺道路的方向，这是一条越走越远、越走越宽的艺术道路。

传递“正能量”是演员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我塑造过女革命家、女干部、女兵、女法官、母亲等不同类型、不同年代的女性，她们的共性是敢于担当、勇于面对。当面临难题时，她们从不会选择推脱，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去克服所有的困难。比如宋鱼水法官，我和她朝夕相处才知道，她为了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历了多少挫折，付出了多少汗水；而基层女干部，在临危受命时毅然撑起大山的勇毅，背后又有多少焦虑和辛酸，她们光荣的背后，必然饱含风霜。这些切身的体验带给我的震撼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艺术上创作感悟，我所能做的就是搭建一座座桥梁，让人物直抵观众内心，去见证她们熠熠生辉的事迹和精神，并以艺术的方式，让其永存。

经历过这么多华丽又质朴的人生轨迹，我豁然开朗，这些角色带给我的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荣誉、沉淀、演员优秀的品质……她们的力量穿透剧本，无形中雕琢着我的品质与修养。慢慢地，我不会因为观众的一时喜好而去改变自己的选择，更多考虑的是这个角色传递的精神气正不正，角色的价值观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我期盼能把演绎过的这些人物的事迹和她们精神传递给观众，让观众也能感受到她们的精神力量。尤其是要告诉现在的“00后”，我们的国家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在关注网络新鲜事物的同时，不要忘记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去做更多有益于自己、于家庭、于国家有价值的事情。

我渴望做一名“流量明星”，不断地扩大“角色影响力”，但我更渴望把流量变成“正能量”，去影响观众，感染观众。

张国男

我们这样延续父辈的情谊

我父亲李公朴和邹嘉骊的父亲邹韬奋是亲密的战友。1935年11月，阎宝航、李公朴、邹韬奋等人在上海成立东北社，以支援东北人民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们两人都是领导人成员。11月23日凌晨，李公朴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7人，在各自家中被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危害国罪”逮捕，即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对七君子宣布取保释放。他们出狱后，先后到了武汉，12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办的《抗日三日刊》合刊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这是两位父辈最后，也是永别的一次并肩战斗。

我和嘉骊是同时代的人。我们的少年时代都是在逃难惊吓中度过，而且都是和父亲聚少离多。和嘉骊真正接触是在1948年10月28日，地下党潘汉年、连贵等部署，委派我父亲的老部下、老同事王健，护送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邹伯母带着嘉骊，萨空了的女儿苦茶和苦茶、张冲的女儿张潜乘坐“湖南号”货轮，从香港回北上，通过天津的国民党封锁线到华北石家庄解放区。我和嘉骊在一起待了12天，虽然她比我大一岁，但是大家都叫她小妹，她那瘦弱的身体和我站在一起也像我的小妹。在船上我们6个少年经常到甲板上唱歌跳舞，嘉骊有时则站在一旁笑眯眯地观看，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加入我们当中。

11月18日，是我们进入国统区天津后的惊险时刻。船到天津塘沽码头停泊靠岸。本准备下船，不料，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到了岸上，一个宪兵小头目跑上船来，命令甲板上的乘客下船，空气极度紧张。这时上来一位穿皮衣的宪兵，他命令码头工人马上拆掉走梯跳板，然后叫华人买办把乘客的名单拿出来检查。

王健这时不顾一切地挤到工作人员当中，他看见小头目手里的一张纸条上写有六个字：“马×伦公模”，马字下面那个字很模糊，根本不像“叙”字，第六个字笔画写得很粗，一看就知道是“模”字之误，旁边还盖了一个图章。领头的手里拿着登记表，开头就叫“李小兰”，这是我的化名。宪兵先盘问我的身份与来历，我毫不慌张，回答得很流利，我母亲接着说：“我是她的母亲，回北方是为了探亲，为了家务事。”宪兵问我们天津的地址，母亲按照王健叮嘱的把住在英租界的商人钟先生的地址告诉了

他们，领头的记了下来，之后便让我们三人到甲板上。然后叫“李沈英”，这是邹伯母的化名。可能是因为她化名姓李，所以盘问的比较详细。盘完后，邹伯母便带着小妹迅速下船上岸。女宪兵开始搜查我们的身体和行李，看得非常仔细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突然，看见我母亲的箱子里有一个大相框，里面没有照片，就把夹层打开了，抽出了一张我父亲的底片，问我这是谁。我一时紧张不知怎么回答，就说我不知道，你问我母亲吧！母亲机敏地回答说公公。又叫叫什么名字，我母亲说叫“李仁保”。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因为我弟弟化名是“李仁杰”，哪有孙子的名字和祖父的名字差一个字的，像兄弟排行。我父亲33岁就开始留胡须，幸亏底片上看不出年龄，只看见大胡子，像个老人。是我父亲标志性的长胡须，帮我们过了这个鬼门关，这也说明这些特务对我父亲和家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下船后，王健把我们一家三口和张潜交给了钟先生。邹伯母、嘉骊等人则去了天津的“裕中饭店”。在饭店里，邹伯母告诉王健，女宪兵曾经问她认不认识李公朴夫人。王健把他看到的宪兵手里的名单情况告诉了王健，这就更证实，这次他们要搜查的对象就是我母亲。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苦茶、苦茶下船时，在船上就纠缠她们的那个穿皮衣的宪兵继续死缠烂打，王健为了保护两姊妹，带着邹伯母和嘉骊也住进了裕中饭店。在饭店里，那个宪兵曾苦苦茶她们说，他是稽查处处长，“湖南号”船上有两个重要的“奸匪”没有抓到。这其中有一个“奸匪”，定是指我的母亲。后来我们得知马叙伦在那天搬家，并没有上“湖南号”，可见在香港所有民主人士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

王健到钟先生家拿了80块钱，又赶回裕中，大家议定第二天一早让苦茶苦茶搬到她们父亲的朋友家去住，邹伯母和嘉骊则去北平邹韬奋的妹妹家。第二天，王健把邹伯母母女顺利地送上了去北平的车。

我们再次相见是在1975年，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邹家华大哥家。我和王健去探望邹伯母，王健和我于1950年结为伴侣。这次我们见到了20多年没见的嘉骊，她还是那样温柔但面带病容，原来她在70年代早期，在四川绵阳出差时感染了乙型肝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邹伯母便陪她在北京看病。

1980年后我陆续收到嘉骊写的书。



2020年7月收到她最后一本著作《我的文字生涯》，读了嘉骊的这本佳作非常感动，没想到我书架上的一本本有关邹韬奋大本头的书都是出于一个柔弱女子之手编出来的。编辑一本书其实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的，我们都知道嘉骊从小体弱多病，要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是需要很大的毅力。从此书中也让我了解到，1944年6月1日，邹韬奋自感病情转危，要求口述遗言。6月2日由徐伯昕记录，有关嘉骊，是这样记录的：“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她父亲的遗言影响着她的一生，既有疼爱又有期待和鼓励。

1996年7月，我去常州参加父亲遇难5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嘉骊联系时，得知邹伯母生病住院，我和王健去医院看望。见到了又20年未见的嘉骊，此时，她在医院照着妈妈。16年后，2012年4月27日，我去上海参加史量才创办的《申报》140周年纪念研讨会。前一天我去嘉骊的家里看望她。多年未见，我们谈得非常开心。中午她还请我和女儿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上海，与她也再未

相见。但是我们的联系从未断过。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说：她整理爸爸的材料里有这么一件事，她父亲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里，想翻译一本英文书，但又怕翻译不好，和我父亲商量。我父亲就鼓励她父亲翻译这本书，还答应翻译完后帮他校对。后来我在翻阅父亲的日记时，看见里面记载着帮她父亲校对的事情，也印证了这个事实。有一次我发现父亲1937年6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晨邹、章、沙三夫人联袂来所，邹太太并带了小女儿来，一时热闹起来。”我便打电话告诉她我父亲日记的内容。她高兴地说：我有印象，我跟妈妈去苏州看守所看过爸爸。这回我有文字记载并知道了日期。

2014年的一天接到她的电话：她把妈妈和宋庆龄多次的书信往来编辑了一本小书，她的这本书从出版局送到统战部审查后，久久没有收到审批情况的消息。希望能找到统战部的熟人，帮她催催。我找到统战部组织部的一位熟人，不久我便接到她的电话说出版局已批了书号，可以排版复印了。2015年1月我有幸读到了嘉骊送给我的这本《别样的家书》。

后来我和嘉骊加了微信，联系更密切

▲ 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左起：徐伯昕、沈钧儒、张曼筠（李公朴夫人）、胡愈之、甘柏林双胞胎女儿、邹嘉骊、沈粹缜、金端苓。

▼ 在“湖南号”货轮上。前排从左至右：张潜、张国男、邹嘉骊、苦茶。后排从左至右：苦茶、张曼筠（李公朴夫人）、沈粹缜（邹韬奋夫人）。



了。她为了写《我的文字生涯》这本书，多次和我联系，核对1948年11月从香港进天津过海关到北平的一些情况。嘉骊以此书为自己有意义的那段人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的这些片段回忆能看出父辈的情谊传给了我们，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我们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继承了他们的遗愿不断奋斗。

嘉骊已经圆满完成父辈的愿望，去年她的90大寿，因疫情，我未能到上海为她祝寿，很是遗憾。我还有不少任务没有完成。我协助江苏省常州市民主同盟，计划出版李公朴小丛书。第一本《公朴书信集》正等待出版局的书号即可出版。第二本《李公朴日记》和《李公朴文集》补充版都已编好，准备送审。这段时间我完成了有关父亲和沈钧儒、高士其、艾思奇三人的友谊三篇文章，并已发表。准备分别写张光年（光未然）、周巍峙两人的友谊，待发表。在嘉骊的鼓舞下，我准备用王健80多年来精心保存下来的宝贵资料写出父亲一生为民主、为新中国的奋斗史。虽然他们那一代人没能赶上新中国成立，但是我和嘉骊作为他们的后代，都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相信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也会露出满意的微笑。